

以多元文化諮商視框探究臺灣原住民族的弱勢處境、因應資源及諮商介入

Exploring the Disadvantaged Situations, Coping Resources, and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from a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Framework

王睦翔¹、鄭博尹²
Mu-Hsiang Wang¹, Po-Yin Cheng²

摘要

隨著諮商普及與社會倡議意識抬頭，關注多元文化議題，並發展因應身處不同文化之族群之處遇策略，已成諮商師助人專業發展的重要素養，而本文所探討的對象為最初踏入臺灣土地的原住民族，其於歷史的洪流中，受到後來者的壓迫，積累跨世代歷史創傷，並形成與漢人社會截然不同的自我認同與生活模式。本文旨在藉由文獻回顧探討臺灣原住民族所面臨的弱勢處境（政策、經濟、家庭教養與教育及受主流文化歧視經驗），以及自日治殖民時期起所面臨之歷史創傷，並梳理歷史創傷對原住民族族群認同發展的影響；同時亦關注原住民族內部獨有因應困境的策略，從中看見部落文化形塑之優勢。文末筆者整理相關文獻，探討原住民族接觸諮商服務之現況，並統整出作為諮商師與原住民來訪者進行諮商工作時，建議注意之四個面向：「覺察自身文化認同，理解並尊重當事人的文化脈絡」、「理解都市原住民獨有的生命經驗」、「落實系統合作，為其賦權」、「融入原住民族獨有的文化一部落組織、信仰及語言」作為參考。

關鍵詞：多元文化、弱勢處境、原住民族、諮商、歷史創傷

^{1,2}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生

通訊作者：王睦翔，（500）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一號，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所），
Email：nightsknow@gmail.com



壹、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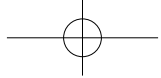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過去傳統的心理學與諮商理論較缺乏多元文化的視角，且假設個體間存在一定的共通性，較忽略文化脈絡對個體的影響（劉安真，2006；Sue, 1992），但隨著時代變遷，社會族群的文化多樣性日趨豐富，「多元文化諮商運動」也日益蓬勃發展，可以視為是在心理動力、行為取向和人本主義之後的「第四波勢力」（Pedersen, 1990）。Sue等人（1992）呼籲諮商專業應重視多元文化視角的重要性，並把多元文化諮商能力區分為三個面向，分別是諮商師「覺察」自身的文化態度、學習多元文化的「知識」，並發展適當諮商「技巧」，同時也強調面對少數族群時應消除過去存在的種族主義和文化偏見。繼多元文化諮商後興起的「社會正義諮商」，更是著重為相對弱勢發聲，以及諮商師倡議的能力（葉寶玲，2016），再再都顯示諮商專業對於多元文化敏感度與捍衛少數族群權益的日漸重視。將視角拉回臺灣，臺灣歷史承載多元文化與族群的社會。隨著過去的歷史脈絡、政治開放和近幾年社會變遷，臺灣的人口結構逐漸改變，而面對多元族群的心理健康需求也成為諮商專業領域愈趨重視的一環（陳秉華，2017）。

筆者過去曾在原住民部落擔任國小教職，在任教期間深刻體會漢人社會與原民部落在文化、宗教習俗與生活習慣等面向的差異，同時亦觀察到當地部落的心理衛生資源被邊緣化的處境。就筆者所在學校場域，孩子若面臨心理困擾，以班導師及兼任輔導業務老師優先進行輔導（因人數編制並無專任輔導老師），若情況嚴重再轉介他校行動心理師進行協助。而部落族人若有身心困擾時

，多半先選擇找身邊朋友及階層組織的部落族人尋求協助與建議，極少數人願意前往距離部落車程約一小時之醫院身心科就診。筆者觀察到，以部落文化習慣與交通易達性而言，在遭遇心理困擾時往往尋求心理諮商不在其選項中。使得筆者更加關注，當諮商專業日趨重視多元文化諮商能力的養成和訓練時，如何面對服務原鄉時所面臨的挑戰？而諮商資源若要進入原住民族人的生活圈中，又應注意哪些面向？因此本文試以多元文化諮商視框，進行文獻回顧，探討原住民族從過去到現在受到的歷史影響和受壓迫的處境，及其族群自我認同與自身的因應方式，試圖回應因應原鄉特有文化與歷史脈絡，能如何引入心理諮商資源，而不再製福利殖民或阻礙原住民族主體性之發展。

貳、臺灣原住民族的弱勢處境

臺灣擁有族群多樣化的特性，且以漢人文化作為主流文化的脈絡下，原住民、新住民與客家人是少數群體，在經濟、社會及政治階層處於相對弱勢（陳秉華，2017），而處於相對弱勢身分使得少數群體在與主流文化接觸時，必然面對諸多面向的衝撞，包含：歧視、刻板印象、壓迫及被主流社會排除等困境，導致少數群體自主權與資源受限，甚至引發身心不適，更甚者形成其族群自我認同阻礙。而本段落呼應Sue等人（1992）提出多元文化諮商能力第一步為「覺察」，筆者藉回顧文獻，形成政策、經濟、家庭教養與教育及受主流文化歧視經驗四個主軸，以理解與探究臺灣原住民族所處弱勢處境之脈絡，作為後續形成多元文化諮商處遇之鋪墊。



一、政策

臺灣原住民族在歷史上曾面臨原鄉被併吞土地、爭奪資源等議題，因而於1999年《原住民族與臺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條約》試圖爭取臺灣原住民族之自然主權、自治權等，影響後續政府2005年通過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然而該法形成後，至今仍與臺灣原住民族落實主權與自治權有落差（蕭世暉，2012），臺灣原住民族至今於政策制定上仍然處於被邊緣化，受到主流文化之壓迫與福利殖民主義策略所影響，企圖迫使原住民族服膺主流文化（王增勇，2010；王增勇、楊佩榮，2017；李明政，2012；洪婉婷、許俊才，2021；張文彬，2016；陳永龍，2010；謝志誠等人，2012）。

筆者綜整探討原住民族在政策制定上所處弱勢處境可分為三大面向探討：

（一）缺乏實質土地權與在地自治權

現今當局認為原住民族自治是「割土地」，甚至會讓原漢「隔離分裂」，設下不改變既有地方自治及行政區劃的條件，讓實質自治寸步難行（蕭世暉，2012）；以禁止原住民族群於原有土地狩獵為例，當局以保育為由禁止原住民族於國家公園狩獵，實則限制原住民族狩獵行為背後的重視祖靈儀式，即為強權侵害弱勢族群（張文彬，2016）。

（二）被迫接受福利殖民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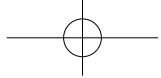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以原鄉長照老人為例，衛生福利部取代原住民委員會籌畫長照專業化制度取代部落照護文化，使得原鄉老人無法依循部落文化獲得照顧，且當提出需求不在專業化制度服務範疇內，更被過度要求個人化為由進行責難（王增勇、楊佩榮，2017；李明政，2012）。

（三）災後重建諮商同意權被漠視

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時，當局首度將「強制遷居、遷村」納入法律條文中，以異地重建為主軸，迫使原住民受災戶被迫離開原居住地，直接剝奪了族人在原鄉居住的權利，強迫族人脫離土地並失去與部落的連結（謝志誠等人，2012），且於籌畫與建設永久屋的過程中，族人無法參與其中討論（洪婉婷、許俊才，2021）。王增勇（2010）更以八八風災後，慈濟協助原住民族重建慈濟大愛村為例，說明原住民族人在現今社會福利政策下弱勢處境。慈濟機構為原住民族人重建慈濟大愛村，但其中居宅建構的初衷、巷弄名稱皆以主流或強勢文化施加於原住民族人身上，此舉反映：1. 善霸現象：臺灣漢人社會以助人的形式，促使原住民族人接受主流文化，卻迫使原住民族犧牲原有文化模式，有文化殖明之實；2. 原住民族像是等待被幫助的客體，或是待解決的問題，而非具備自主決定的主體，原住民族原有文化的優勢力量亦不被看重，從更大層次來看，此反映社福體系民營化的缺陷，而加重原住民族弱勢處境。

二、經濟

謝文明等人（2022）指出原住民族亦屬弱勢經濟族群，因著原鄉部落土地權喪失、農業式微及工業化等影響，原住民族人聚集於都市周圍地帶，因受限於教育資源不足及經濟能力限制，影響其教育程度及職業技能，使得就業選擇受限（原住民族委員會，2022；黃樹民、章英華，2010）。行政院主計總處（2022）資料顯示，原住民有酬就業者每人每月平均收入少於整體國民平均收入約25.0%，有酬者每月主要收入未滿3



萬元者約44.7%，亦高於整體國民之26.7%。衛生福利部統計處111年底統計原住民族低收入人數3.1萬人，占比5.3%，亦高於整體國民比例之1.2%。就業工作類型中，原住民族從事職業為主要包含「技藝有關工作人員」（17.3%）、「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15.4%）及「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13.5%）合計約46.2%，高於整體國民之30.5%；而觀察勞動部（2022）發布《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發現上述職業別國民月均收入皆為各產業中收入較低之職位，也應證了原住民族收入較低一部分原因也與謀求職位有關。郭俊巖與許佩茹（2010）訪談信義鄉返鄉部落謀生之青壯年，原住民青年受限於教育資源與原生家庭教養，其低教育程度確實限制職業選擇與發展。

三、家庭教養與教育

原住民族受到家庭經濟影響，父母整天忙於生計，無暇參與子女的教育活動，且因忽略親職而產生家庭問題，而更有原住民家庭父母出外謀生，因而嬰孩自小接受隔代教養（張再明，2014）。引述原住民委員會《110年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年度報告》，原住民族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高級中學以下（含）比例約七成，高於整體國民之五成將近兩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22），顯示原住民族接受大學以上高等教育的比例較低，也間接使原住民族青年就業選擇受限。原住民族委員會（2022）出版之《110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110年原住民於高中以下各階段就讀率皆達95.0%，惟就讀大學以上比例為58.8%，低於整體國民的91.0%；原住民族中、小學生輟學率約為整體國民的五倍；高

級中等學校以下各級學校學生隔代教養比例、依親教養、單親家庭比例，皆高於整體國民。駱俊賢與邱道生（2013）以花蓮縣秀林隔代教養家庭為研究，指出祖父母受限於自身教育受限，在隔代教養中難以回應孫子女課業輔導及教導溝通技巧等問題。

四、受主流文化歧視經驗

種族歧視指任何基於個人膚色、種族或種族血統所產生的歧視，歧視形式包含：拒絕與特定群體有生意往來、社交或分享資源。Sue等人（2007）進一步提出種族隱微歧視的概念：「短暫而普遍與日常的言語或非言語中，無論是有意圖或無意圖的，在溝通中因他人膚色而傳達敵意、貶抑或負向種族觀點及侮辱。」劉鶴群（2006）提及臺灣原住民族遭受之種族歧視主要來源來自於漢人大眾媒體及教育體制，而儘管現今漢人對原住民族人外顯的歧視而產生的衝突與敵意不若過往嚴峻，仍將原住民族的經濟弱勢與其種族特徵連結，以合理化漢人的優勢地位，由此顯示原住民族受到的歧視型態轉變為種族隱微歧視。

筆者彙整國內探討原住民族遭受種族隱微歧視的文獻，歧視源可歸三類：

（一）源自大眾媒體的歧視

黃之棟與朱容萱（2019）以「大尾鱸鰻2」剖析其中隱射原住民族之服務、橋段及場景，呈現出主流與非主流文化之優劣觀點，試著使觀眾認為類原住民人是胡言亂語，也因具有隱射意味使原住民族人感到被歧視與冒犯。

（二）源自主流社會價值觀的歧視

教育部（2020）指出基於主流價值觀對原住民族想像的歧視言語，如：「你應該很會唱歌吧？要不要唱給大家



聽？」、「你們都喝小米酒，酒量一定很好吼？」等對原住民族飲食及文化之想像帶來的歧視。而這些看似主流社會價值觀因原住民身分不經意的期待，實則為一種隱微侮辱。

（三）民眾對原住民族受到補償措施的片段理解引起的歧視

Teyra等人（2022）提及都市原住民學生儘管獲得升學加分之補償措施，但若不符合大眾對原族民之刻板印象，如：須諳族語、外表要夠黑、居住在偏鄉或山地等，則會接受到隱微侮辱，被質疑不夠有資格獲得升學加分。

Teyra等人（2022）引用少數壓力理論，進一步指出受到主流文化歧視的影響，個人會試圖隱匿自己受壓迫身分，避免再次陷入被歧視的困境，甚至內化汙名，歧視同為受壓迫者；而諸多學者也認為歧視與隱微歧視對身心有負向影響，包含：焦慮、憂鬱、降低幸福感及低自尊等。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語言小組（2018）訪談原住民族受歧視經驗，與Teyra提出呼應，國民時期說族語被汙名化，使得受訪者盡量把自己隱身，甚至當時認為原住民族的身分是一種污辱。

五、小結

綜觀原住民族弱勢處境，受到其獨特身分與政策影響，在經濟、家庭教養與教育及受主流文化歧視經驗等面向彼此環環相扣、交互影響。而從多元文化諮商視角，筆者反思與原住民族人進行諮商工作中，需要敏感地覺察到原住民來談者，其生長脈絡、當前議題與所處弱勢處境之交互影響，包括：受到漢族制定政策的不平等、家庭經濟困境、親職教養資源稀缺經驗，以及受到種種來

自主流文化或周遭師長同儕之歧視與隱微歧視，都可能加深原住民來談者的議題與身心調適之困難，諮商師需要協助其辨認、重構，並為其賦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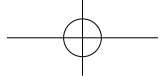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參、原住民族受壓迫的歷史創傷與族群認同議題

原住民族除面對當前的弱勢處境，筆者認為更需理解原住民族在被主流霸權壓迫的歷史軌跡中所面臨的歷史創傷，以及歷史創傷又如何阻礙原住民族人形成族群認同，進而能更深層地協助來談者建構穩固與健康地自我認同—即從何而來，又通往何處。

一、受壓迫的歷史創傷

日治殖民時期，日本政府為開採山地資源，對原住民族採行鎮壓、同化與教育等手段，並嚴禁原住民族施行部落傳統風俗習慣，以使其歸順日本（林素珍，2015）。對原住民族的影響包含：被迫接受強勢文化與語言、被占地而被迫遷往他處、被迫勞動與剝削及原住民族原有文化及部落意識逐漸弱化等歷史創傷（李巫秀珠，2013）。以霧社事件為例，鄭勝奕（2013）更指出霧社事件是賽德克族人不願意多談的內部創傷，不願因被壓迫而失去尊嚴與自我意識，因而得壓抑心中的傷痛，而部落耆老不願提及受壓迫的歷史事件，也影響後代對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的理解，產生文化傳承的斷裂。

諸多學者亦提出國民時期政府具有歧視與壓迫之措施。如：民國34年，政府訂頒「臺灣省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硬性要求原住民族更改漢姓；民國52年政府推動山地改進方案計劃，未考



量達悟族原有文化及住宅習性，拆除達悟族傳統居宅，改建為國民住宅，而破壞族人原先搭建臨時屋或工作屋，依循族裡照顧家中老人的風俗（張淑蘭，2009）。省政府民國63年頒布《臺灣省各縣山地鄉國語推行辦法》要求山地國民學校糾正使用日語及方言，否則受到掛牌、體罰、勞動服務及罰錢等羞辱與處罰措施（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語言小組，2018）。

而近代原住民族仍持續面臨被政府與財團爭奪土地的威脅，仍無法遏止土地被剝奪與濫用的痛楚，如：民國63年太魯閣族被迫交出土地而引發「反亞泥還我土地」歷經30年抗爭的活動（陳竹上，2010）、103年花蓮秀林鄉山林資源被掠奪而引發的「護木事件」（拉高·迪迪，2018）。

面臨種種壓迫，原住民族曾經歷高壓統治下被佔領居住地、被迫放棄自己語言與文化，向學習強勢文化靠攏等歷史創傷；而近代原住民族捍衛自主權意識抬頭，企圖內部連結部落與教會形成與漢族對話的管道，對外採取社會運動嘗試訴諸法律行動與社會運動抗爭（拉高·迪迪，2018；陳竹上，2010），一步步拿回屬於原住民族的土地權與自主權。

儘管當今社會轉向支持原住民族爭取應有權益，諸多學者仍提醒歷史創傷對原住民族影響甚深。Teyra等人（2022）指出歷史創傷持續影響著原住民族，使得族人代間的文化傳承困難重重，造成當代族人的種族認同危機，同時對於外來的族群保持警戒與防衛；張宜君與林宗弘（2012）提及原住民族面臨歷史創傷與持續性處於弱勢處境，因而在面臨天然災害時受創更深，也使得災後恢復力較差；王增勇與郭孟佳（2020）更從歷史創傷角度解構原住民族家庭暴力，

原住民族藉由觀光營生，試圖迎合主流價值，卻引發夫妻失和甚至將強勢文化壓力發洩於親近者身上，儘管此論述仍牽涉更多複雜的因素，卻也使我們一窺歷史創傷對原住民族人與人之間互動之影響。

綜合上述，身為漢族諮商學習者，對於原住民族經歷的歷史創傷如不加以理解，便將原住民來談者行為表現歸為族群特性或個人特質，都將造成二度傷害；另一方面原住民族因著歷史創傷，原先非原鄉者已採取防衛姿態，若再強加漢族主流框架之價值觀提供服務，勢必引發衝突，甚至再次勾動原住民族的歷史創傷，屆時將再製福利殖民，以服務之名，行剝奪原住民族自主權之實。

二、族群認同

延續自過去的歷史創傷與如今依然被剝奪的權利，以及主流文化轉為隱微歧視的傷害，都阻礙著原住民族形成穩固且具包容性地族群認同。楊淳皓（2004）認為族群文化認同意涵分別包含「個人對於自身所屬族群文化的認同度」及「對非所屬族群的態度」兩構面，而個人族群文化認同則會影響其自我認同程度。

杜曉梅（2015）則提出影響原住民族群認同的因素。認為原漢雙族裔對原住民身分的認同中，環境因素大於原生血緣，原住民身分認同是被建構的，而且會流動的。而影響原住民身分認同主要因素包含：社會環境與輿論及政策、師長及同儕看法及家庭教育等。在社會環境、輿論及政策的部分，若出現批評原住民族的聲浪，如：民眾因加分政策、工作權保障誤解，原漢雙族裔會試圖隱藏自身的原住民族身分；而當原住民



族有值得誇耀的人事物出現時，原漢雙族裔也會為原住民族身分而自傲；就學期間，原漢雙族裔若接收到周遭師長與同學對原住民族有歧視，則會加深對自身原住民族血統的排斥；而原漢雙族裔父母受到上一代的傳承或自身曾遭受傷害的經驗，會提醒子女不要主動對外承認自己有一半的原住民族身分，以保護子女不受傷害。面臨上述歧視與困難，皆使得原漢雙族裔子女對自身身分認同產生擔憂與矛盾。

Teyra等人（2022）指出都市原住民因生長於都市，受主流強勢文化薰陶，因此在形成自身原住民族群認同時，面臨更多掙扎與阻礙。都市原住民就學期間往往得面對來自同儕原漢差異的歧視與排擠，包含：來自膚色與五官的差異、加分政策的誤解，施加其身上的隱微侮辱；而即使族人為自己挺身而出，表示自身因歧視而感到不舒服的經驗，同儕以「我不過是開開玩笑」、「玻璃心」等回應，使族人經驗隱微漠視，帶來更深層的傷害。而都市原住民與部落的族人接觸時，也須面臨不被族人認可的經驗，如：「都市的那些原住民不是原住民」；甚至自身母親也不認為自己是族人：「不會講族語，從小不在部落長大，所以即便我們是她的小孩，但就不是原住民。」

綜上所述，顯示理解原住民族族群認同時，仍須同時考量社會脈絡與個別差異。原漢雙族裔、都市原住民與部落生長的原住民所處社會處境、周遭重要他人對自身族群身分的認同，以及與部落連結與認同等皆可能處於不同的脈絡。因此在理解原住民族人族群身分認同時，若未經考量就將部落原住民族身分的理解推及整個族群，則有造成更多壓迫與傷害的隱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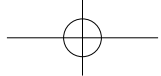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肆、原住民因應困境的方式

誠然行文至此，筆者多著墨於原住民族之弱勢處境及歷史創傷之影響，然則原住民族仍保有獨有文化，支撐其在受壓迫的主流框架中復甦與發展。此更為以多元文化諮商視框看待原住民族重要的一環，不僅要貼合來訪者的生命經驗，更要欣賞來訪者的韌性與獨特的世界觀，以更全面地理解來訪者被問題困住的根源，形成有效而最小傷害性之處遇策略。

一、信仰

不同的原住民族群有其各自的人類起源及發祥地傳說，而形成不同的信仰觀念。原住民傳統的祖靈信仰或階層式的多神信仰，與其族群文化、知識、社會制度、歲時祭儀等皆息息相關（王嵩山，2001）。綜觀各原住民族之傳統，大多數為「泛靈信仰」，亦即萬物皆有靈，強調生活教育與在自然中生存、生活的能力，重視人與自然、人與土地的關係（沈明仁，1998）。宗教傳統儀式主要執行人，在不同部落有不同稱呼，或稱執事、祭司、巫師，某種程度上成為族人問事、部落組織決策及政治影響的核心角色（王嵩山，2001）。

然而隨著不同國家的殖民政權更迭與漢人遷台，原住民族群的信仰組成日趨多元。目前以天主教及基督長老教會等基督宗教信仰為最多。沈明仁（1998）表示，許多族人的歲時祭儀受到外來文化及宗教的侵入，已漸漸喪失殆盡或轉而成為商業性的文化表演。但王嵩山（2001）卻認為，原住民各族因著這些社會形式的改變，進而發展出性質不同



的儀式實踐，以不同的樣貌呈現出宗教與其他制度的結合。簡言之，不論是傳統信仰抑或是日趨多元的現代宗教，對於原住民部落的生活、文化、制度，以及生活和精神支持皆有相當的影響力。

在探討部落親密關係暴力經驗中，沈慶鴻（2017）探究部落親密關係暴力經驗，便指出將文化和信仰帶入處遇方案，能協助原住民族受創者進行創傷修復，是多數方案都強調的處遇要素；王翊涵（2020）則指出培力泰雅族受暴婦女的重要原則之一為借重並借力使力教會信仰。在原住民鄉救災經驗與復原力歷程中，Liu與Chen（2014）提出來自信仰的精神力量具重要的創傷療育功能；謝淑敏（2013）訪談艾莉風災受創之國中原住民學生，也提出天主教信仰與舉辦哀悼儀式、神職人員領唱聖歌都幫助學生身心安定；陳亭君等人（2013）亦指出災後原住民族顯示存在著復原力，此可能與原住民族宗教文化之影響有關，原住民祖靈神聖力量的穩定信念與實踐，成為族人面對災變的自我保全系統。

綜上所述，諸多學者不約而同指出，面臨重大災害、人際困境，原住民族信仰都是一個重要的支撐與復原的力量，諮商師必須正視與融入諮商處遇。

二、部落文化

除達悟族和泰雅族之外，其餘各族皆有年齡階層的分級組織（達西烏拉灣·畢馬，2001）。以阿美族為例，男子約莫在十三至二十歲加入階層，按其年齡每隔四、五歲為一個層級，且終生隸屬於該階層（王嵩山，2001；達西烏拉灣·畢馬，2001）。又以排灣族來說，其階層為階級化的宗支組織，透過世襲取得階層地位，且可以藉由階級外婚來

變更其身分地位（王嵩山，2001）。階層的運作在政治、祭祀、儀式，甚至是教育及感情交流上皆扮演重要的角色。沈慶鴻（2017）即指出部落介入、部落參與，原本即是原住民族衝突處理的重要機制，原住民族非常重視部落意見領袖的建議。

許惋稜（2014）透過深度訪談蒐集來自排灣族、布農族與賽德克族的五位研究參與者對心理健康的看法，研究結果顯示當談及心理健康時，原住民族人較看重與人之間建立良好、密切的連結和關係，這源自於自古至今部落內所維持的互助、照顧的社會責任。而對於族人如何維持並促進心理健康，其一是家庭、教會、部落等社會支持系統，另一方面則是透過正向思考、自我實現的行動，以及靈性的豐盈來增加自我內在韌性，包括與自身內在、他人、自然環境、神靈之間的連結關係，透過舞蹈和祈禱獲得療癒的力量。該研究結果顯示信仰及部落的社會組織對族人因應困境及維持心理健康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誠如諸多學者提出部落文化不僅是原住民族的重要因應資源，學者卻也再再提醒外來者在引入外界資源時，更需要考量在地化並遵循部落文化（王增勇、楊佩榮，2017；沈慶鴻，2017；莊曉霞，2019；葉怡廷，2019；Kui & Aki, 2013; Liu & Chen, 2014），如：在長照方面，葉怡廷（2019）觀察到原住民族獨有的照護文化現象，原住民居家服務者往往視為被照顧者的子女、親友，服務本質是原住民族的互助與扶持精神；而王增勇與楊佩榮（2017）則指出現有長照勞動商品化的個人主義框架下，原住民族以互助為原則的部落照顧精神被排除，莊曉霞（2019）更指出原住民族被服務者，期待服務者具有地緣關係或血緣關係，非原住民身分的社工則需透過



認同原住民族文化，強化服務的使命感、在地性和延續性，以維護被服務族人的權利。

伍、原住民族與諮商

現行探討原住民族接觸諮商經驗之研究甚少，以下我們依據邱珍琬（2017）提出之架構說明原住民接觸諮商現況，後續則提出諮商師能如何裝備相應知能，以回應現行原住民族諮商之困境與需求。

一、原住民族接觸諮商現況

（一）可接受度與可使用

原住民族人若有心理或情緒上的困擾，多半會尋求同儕支持或是宗教慰藉，如尋求傳統部落巫師、教會牧師或神父的協助。若是求助於陌生的專業助人者，則可能須承擔親友與族人間的汙名，被視為「有病的人」。因此，原住民族較少尋求諮商協助的原因，一方面是對於諮商資源與身心困擾的不熟悉，無法相信諮商資源能對其帶來幫助，抑或是害怕汙名；另一方面，族人與諮商師的關係建立也是一項挑戰。楊淳皓（2004）提到若是雙方對自我的族群意識不夠成熟，對於建立健康諮商關係會有其挑戰。非原住民族諮商師也可能在口語間流露出隱微歧視，造成原住民當事人抗拒。

（二）可接近性

多半的原住民部落位於偏遠地區，與一般醫療機構及社福衛生單位相距甚遠，因此造成心理衛生服務的不可接近性。若衛生福利單位與部落集會所、教會或當地社福單位合作，較有機會使心理諮商資源進駐部落。

（三）可負擔性

許多原住民族家戶的所得較低，負擔家計尚能勉強度日，但若要使用收費較為昂貴的諮商服務便是龐大的負擔。除了晤談費用之外，交通費用及時間成本也都會讓原住民族人在使用諮商資源時承擔許多壓力。

二、諮商師與原住民諮商時需考量面向

（一）覺察自身文化認同，理解並尊重當事人的文化脈絡

楊淳皓（2004）的研究統整不同理論對優勢民族與少數民族之族群文化認同的階段劃分。當屬於優勢民族的諮商師面對少數族群的當事人時，諮商師擁有成熟的族群文化認同對於諮商效果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當諮商師能接納自身的文化認同，並充分了解當事人的文化處境和脈絡，便能更有意識的回應當事人的需求，而不是對其產生偏見與歧視。張籃心（2023）透過訪談整理漢族心理師在進行原住民族人諮商工作時的經驗、困境和因應策略，結果也特別強調心理師應覺察自身的文化認同和偏見，試著進入當事人的文化脈絡，尊重並理解與自身不同的文化，發展「文化同理心」，才能在跨文化工作中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二）理解都市原住民獨有的生命經驗

除了覺察並尊重不同文化間的差異外，諮商師也應留意在原住民族群之間存在的壓迫與歧視。Teyra等人（2022）整理了都市原住民身處主流社會所面臨的各種挑戰。他們以原住民身分居住於都會區中，不只會承受主流社會的歧視與排擠，質疑其居住在都市卻使用原住



民加分福利的正當性，以及時常面臨的微歧視，看似沒有惡意卻在無形中傳達歧視與侮辱的話語；另一方面，都市原住民承受的更大壓力來自於族群內部的質疑。因為長期居住於都市，許多部落族人會認為這些都市原住民沒有文化、忘記他們的根，「根本不是原住民」。許惋稜（2014）的研究參與者也提及許多原住民族人為能在依循現今的「國家制度」、「都市主義」的社會生存，甚至「改造」自己或以妥協的姿態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其中隱含著必須壓抑自己原本的特質、文化和生活方式，承受許多壓迫及相對被剝奪感，並以心理健康作為代價交換生存的權利。

諮商師應充分了解原住民族人在歷史上承受的創傷經驗，來同理都市原住民所處的處境與文化脈絡，並且時時覺察他們可能會接收到來自諮商師自己或是身邊其他人的隱微歧視。諮商師充分的自我覺察，才能盡可能避免在諮商過程中產生的隱微歧視，進而成為支持當事人的力量。

（三）落實系統合作，為其賦權

王增勇（2010）以八八風災後的慈濟大愛村為例，點出了目前臺灣在執行社會福利及救助時，經常忽略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現況。文中提到，這種以部落為「方案實施場域」而非「方案發展的主導者」的救助方式，忽視了原住民族本身存在的力量，而更加深其為「需要被幫助者」的弱勢形象和上下權力關係。外部團體應抱持的態度，是謹慎思考過去原漢之間的殖民歷史，並深切反省是否複製這樣的殖民模式。而具體的執行方式可能是培養在地組織，透過賦權，給予部落更多的自主性和自治權力，讓在地人規劃與執行在地的發展。

文中雖未提及這樣的現況與諮商的關係，但筆者認為可以相互呼應並引以為鑒。不僅在諮商關係中需要幫助原住民族人檢視主流文化壓迫對其影響，並幫助其理解與漢人文化有差異但不代表文化優劣；同時我們也需要成為倡導者，幫助原住民族發聲，凸顯現有原住民族在救災、助人行業中被排除的事實，以尋求政策改變、主流意識的鬆動與轉變；同時也幫助原住民族肯認族群文化特色，承繼在地化資源與部落文化資產發展社區，甚至投入社會參與，與主流文化諧同發展。

（四）融入原住民族獨有的文化一部落組織、信仰及語言

前文提到，原住民族的階層組織和宗教信仰（包括傳統信仰及基督宗教信仰）對其文化、政治，甚至是心靈慰藉與情感支持皆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些原住民族特有尋求支持的管道，不應該成為諮商資源引進部落的絆腳石，更可藉由合作以提供最完整的助人服務。Turner與Pope（2009）提到，可以結合儀式、祈禱或是部落原有的醫療模式，讓諮商與部落的傳統相互合作。邱珍琬（2017）則建議，結合當地教會、學校及部落辦公室等機構，舉辦活動的同時也能進行心理衛生宣導，如此部落諮商服務整合當地資源以落實在地化，才能有長期成效；或效法許多部落課輔班的模式，與當地耆老或具有社會聲望的人士合作，例如：牧師、長老等，共同在社區推廣心衛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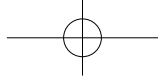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趙祥和（2014）的研究紀錄八八水災後進入災區進行心理復健工作的案例，研究結果提及將原住民病患的文化、宗教信仰融入服務當中，以災民熟悉的議題與其建立關係，較能突破受服務對象面對專業人員時產生的防衛和抗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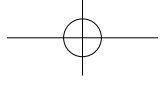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進而增加服務的品質和效能。張籃心（2023）也提醒漢人心理師在進行原住民族人諮商工作時，應試著學習部落的相關文化知識及語言，或是透過當事人熟悉的非語言媒材當作溝通的橋樑，如圖騰與歌唱等，更能貼近當事人的脈絡以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參考文獻

- Teyra, C.、黃焯愷、Ciwko, L. (2022)。我不夠格嗎？都市原住民青年內外交困的歧視處境。*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5**（3），249-274。https://doi.org/10.30074/FJMH.202209_35(3).0002
- 王翊涵（2020）。姐妹們，Lokah！培力原住民族婦女參與家暴防治初級預防的實踐與反思。*東吳社會工作學報*，**39**，1-37。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10264493-202012-202104130017-202104130017-1-37
- 王嵩山（2001）。臺灣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聯經。
- 王增勇（2010）。災後重建中的助人關係與原住民主體原住民要回到誰的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8**，437-449。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1006.0013
- 王增勇、郭孟佳（2020）。歷史創傷與原住民族社工的實踐：如何以故事解讀原住民族家庭暴力？。*社區發展季刊*，**169**，271-284。
- 王增勇、楊佩榮（2017）。夾在國家政策與原住民族文化之間的原鄉居家服務。*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0**（1），7-35。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703_30(1).0002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22）。111年5月人力運用調查統計結果。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https://www.stat.gov.tw/News_Content.aspx?n=3703&s=230174。
-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22）。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行政院性別資料庫雲端應用服務。https://www.gender.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Query.aspx?sn=Mm4ACreYMwEr7cuT6no39g%40%40&statsn=MUwvQW33tN8mhR194KFn2g%40%40&d=m9ww9odNZAz2Rc5Ooj%24wIQ%40%40
- 李巫秀珠（2015）。〈蕃界的人們〉作者野上彌生子之人格特質的主觀感受和「理蕃政策」的差異性。*衍學集*，**7**，72-86。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20906001-201501-201507020012-201507020012-72-86
- 李明政（2012）。原住民族社會福利體制的建構。*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2**（2），27-46。https://doi.org/10.6396/JTIS.201206.0027
- 杜曉梅（2015）。原住民身分與文化認同—以原漢雙族裔為例。*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17**，147-167。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a0000575-201506-201804200010-201804200010-147-167
- 沈明仁（1998）。崇信祖靈的民族賽德克人。海翁。
- 沈慶鴻（2017）。「部落介入」親密關係暴力之經驗與態度：以四個族別的原住民部落為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21**（2），55-115。https://doi.org/10.6785/SPSW.201712_21(2).0002
- 拉高·迪迪（2018）。青年看銅門部落議題。*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8**（2），193-199。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61117001-201806-



- 201810110021-201810110021-193-199
林素珍 (2015)。阿美族遭逢外來政權的二個歷史事件。原住民族文獻，**21** (2)，6-11。https://ihc.cip.gov.tw/EJournal/EJournalCat/248
- 邱珍琬 (2017)。原住民諮商。載於陳秉華 (主編)，多元文化諮商在臺灣 (頁505-544)。心理。
- 洪婉婷、許俊才 (2021)。永久屋永久嗎？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政策十年後的省思。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11** (2)，169-194。https://doi.org/10.3966/222372402021101102005https://doi.org/10.3966/222372402021101102005
-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22)。110年全年度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https://www.tipp.org.tw/statistical_article.asp?F_ID=114228&FT_No=25
-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22)。110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112學年度原住民教育調查統計工作計畫。https://www.ns.org.tw/history-report/110%E5%AD%B8%E5%B9%B4%E5%BA%A6%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6%95%99%E8%82%B2%E8%AA%BF%E6%9F%A5%E7%B5%B1%E8%A8%88%E5%A0%B1%E5%91%8A%E6%9B%B8.pdf
- 張文彬 (2016)。從環境正義的觀點探討台灣原住民狩獵與國家公園。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9** (3)，91-134。https://doi.org/10.29910/TJIS.201611_9(3).0003
- 張再明 (2014)。弱勢族群家庭司法保護服務的策略與作法—以原住民族為例。日新司法年刊，**10**，436-446。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200605001-201401-202006050015-202006050015-436-446
- 張宜君、林宗弘 (2012)。不平等的災難：921地震下的受災風險與社會階層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4** (2)，193-231。https://doi.org/10.6350/JSSP.201206.0193
- 張淑蘭 (2009)。從獨居到分開居住：以三位達悟老婦人為例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慈濟大學。
- 張籃心 (2023)。漢族心理師之跨文化諮商工作經驗—以原住民諮商為例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 教育部 (2020)。我又沒有惡意，怎麼會是歧視 [動態貼文]。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405240086317285/posts/1711476352360312/
- 莊曉霞 (2019)。部落族人對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期待：去殖民觀點的想像。臺大社會工作學刊，**40**，87-129。https://doi.org/10.6171/ntuswr.201912_(40).0003
- 許婉稜 (2014)。聽、聽見、聽懂：臺灣原住民心理健康之研究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 郭俊巖、許佩茹 (2010)。失業者返回部落謀生的就業歷程之研究—以信義鄉為例。社會發展研究學刊，**7**，1-28。https://doi.org/10.6687/JSDS.2010.7.1
- 陳永龍 (2010)。河岸邦查部落再生與漂留族群生計重建阿美族「都市原住民」自立家園的社會安全涵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7**，135-175。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1003.0004
- 陳竹上 (2010)。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無家可歸？從「反亞泥還我土地運動」檢視台灣原住民保留地政策的虛實。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7**，97-



- 134。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1003.0003
- 陳秉華 (2017)。臺灣是多元文化的社會。載於陳秉華 (主編)，**多元文化諮商在臺灣** (頁3-26)。心理。
- 陳亭君、林耀盛、許文耀 (2013)。原住民與漢人族群的災變因應與心理適應關係探討：以莫拉克風災為例。**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6** (2)，249-278。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306_26(2).0003
- 勞動部 (2023)。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 (資料時間：111年7月)。https://statdb.mol.gov.tw/html/svy11/1135all.pdf
- 黃之棟、朱容萱 (2019)。你還是不懂我的明白—「大尾鱸鰻2」原住民族歧視風波的批評論述分析。**臺灣民主季刊**，**16** (1)，89-126。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17269350-201903-201905300006-201905300006-89-126
- 黃樹民、章英華 (2010)。台灣原住民政策變遷與社會發展 (精裝)。中央研究院。
- 楊淳皓 (2004)。原住民族諮商中的族群文化認同發展議題。**輔導季刊**，**40** (4)，9-15。https://doi.org/10.29742/GQ.200412.0002
- 葉寶玲 (2016)。多元文化諮商的核心：社會正義諮商。**輔導季刊**，**52** (2)，13-21。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19966822-201606-201606160027-201606160027-13-21
- 達西烏拉灣·畢馬 (2001)。台灣的原住民—阿美族。臺原。
- 趙祥和 (2014)。短期社區諮商介入災難救援場域之初探性研究：以八八水災的心理復健工作為例。**教育心理學報**，**45** (4)，517-538。https://doi.org/10.6251/BEP.20131022
- 劉安真 (2006)。諮商師訓練的新挑戰—論多元文化諮商能力與訓練。**弘光人文社會學報**，**4**，167-185。https://doi.org/10.29933/SHSS.200605.0009
- 劉鶴群 (2006)。臺灣真的是多元文化的社會嗎？—當代的種族歧視與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化。**真理大學人文學報**，**4**，333-367。https://doi.org/10.29962/TOJA.200603.0013
-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22)。低收入戶戶數及人數 (111年版)。衛生福利部統計處。https://www.mohw.gov.tw/dl-27850-056a753c-fbce-4fff-a373-530accaf6572.html
-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22)。原住民低收入戶戶數及人數 (111年版)。衛生福利部統計處。https://dep.mohw.gov.tw/DOS/cp-5337-62357-113.htmlhttps://www.mohw.gov.tw/dl-22057-d27857d7-7934-4dc0-befd-d36fe271eedb.html
- 鄭勝奕 (2013)。歷史再現的詮釋權—以比令·亞布《霧社·川中島》為討論對象。**臺東大學人文學報**，**3** (2)，25-51。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30128005-201312-201609300009-201609300009-25-51
- 蕭世暉 (2012)。矢志為受苦族人射下烈日的泰雅勇士—多奧·尤給海。**新使者**，**133**，63-70。https://doi.org/10.29949/TNM.201212.0014
- 駱俊賢、邱道生 (2013)。原住民族群隔代家庭祖孫教養態度之探討—以花蓮縣秀林鄉為例。**商業現代化學刊**，**7** (1)，155-180。https://doi.org/10.6132/JCM.2013.7.1.08
-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



- 員會語言小組 (2018) 從政府公文書初探「推行國語運動」對原住民族語言使用限制的歷史脈絡。《*原住民族文獻*》，36 (3)，13-30。https://ihc.cip.gov.tw/EJournal/EJournalDetail/36
- 謝文明、王德強、高宏華 (2022)。台灣布農族社會經濟發展議題之探討。《*亞太經濟管理評論*》，25 (1&2)，67-92。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16828062-202203-202212020014-202212020014-67-92
- 謝志誠、傅從喜、陳竹上、林萬億 (2012)。一條離原鄉愈來愈遠的路？：莫拉克颱風災後異地重建政策的思考。《*臺大社會工作學刊*》，26，41-86。https://doi.org/10.6171/ntuswr2012.26.02
- 謝淑敏 (2013)。艾利風災中國中原住民族學生的創傷、因應與復原歷程分析—以學校為基礎的災後心理復原工作。《*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5，1-38。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17285186-201304-201309160003-201309160003-1-38
- Liu, C. J., & Chen, S. C. (2014). A cultural experience in disaster trauma intervention: Exploration and learning processes in working with the victims of 88 typhoon at an aboriginal village in Taiwan. *Journal of Taiwan Counseling Psychology*, 2(2), 31-48.
- Pedersen, P. (1990). The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as a fourth force in counseling.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12(1), 93-95.
- Sue, D. W., Capodilupo, C. M., Torino, G. C., Bucceri, J. M., Holder, A. M. B., Nadal, K. L., & Esquilin, M. (2007). Racial microaggressions in everyday life: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4), 271-286.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62.4.271
- Sue, D.W., Arredondo, P., & McDavis, R.J. (1992).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competencies and standards: A call to the profess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0(4), 477-486. https://doi.org/10.1002/j.1556-6676.1992.tb01642.x
- Turner, S. L., & Pope, M. (2009). Counseling with north America's indigenous people. In C.M. Ellis & J. Carlson (Eds.), *Cross cultural awareness & social justice in counseling* (pp.185-209). Routledge.
- 投稿日期：113年02月06日
第一次修改日期：113年03月23日
第二次修改日期：113年06月10日
通過日期：113年12月05日